

20世纪中国学术问题研究丛书

20世纪中国佛学 问题

BUDDHISM OF CHINA
IN TWENTIETH CENTURY

麻天祥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学术问题研究丛书

20世纪中国佛学 问题

BUDDHISM OF CHINA
IN TWENTIETH CENTURY

麻天祥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佛学问题/麻天祥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7
(20 世纪中国学术问题)

I.2... II. 麻... III. 佛教史: 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3399 号

《20 世纪中国学术问题研究》丛书

20 世纪中国佛学问题

麻天祥 著

责任编辑: 龙育群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 12.75 字数: 330000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5—3274—8/G·3269

定价: 21.5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学术之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疑是学术问题的不断提出，不断解决，又不断提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不断往复循环，既构成了整个学术发展的历史，也推动了学术之进步与繁荣。

20世纪中国学术之历程，就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并取得重大进展与成就的。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史无前例的独特性，其学术之发展，特别是其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较之以往任何时期，也就更具特色，而其所得，其所失，其所迷，其所惑，对中国学术之未来发展也就更具影响力。

因此，在20世纪行将逝去的时候，对构成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影响面广且深的问题作一历史的回顾与理论思考，并将其成果以丛书的形式推出，这对中国学术在下一世纪之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无疑也就有了迫切的现实意义与重大的理论意义。

为此，我们拟推出系列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问题》。

丛书旨在将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那些重大的学术问题梳理出来，并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历史性回顾与理论性思考，发掘出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之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学术之进一步发展提出合理的展望性意见。

由于丛书所涉对象为百年中国学术史，因此，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首倡的。也就是说，史料的研究是第一位的。丛书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反对脱离历史史料的研究而空谈逻辑的抽象，以论代史；也不赞成编年史般的史料罗列，以史代论；而提倡在尊重历史，详细地、深入地钻研史料的

基础上进行科学的逻辑抽象，尽可能地将所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脉络抽取出来。

丛书倡导叙述的方法是逻辑的。也就是说丛书更着重其理论性而不仅仅在于其历史性。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抓住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历程中那些重大的、真正构成中国学术发展之链的纽结的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由微入渐的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无须刻意求全，但求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不囿成说的看法。丛书希望以这样的叙述方法能奉献给读者以合乎逻辑的，因而也更真实的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画卷。

丛书选题将以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最具学术价值、且对社会文化层面影响广且深的学术问题为主体，因而将不以学科分类设题，但各学科均会尽量涉及。纯自然科学类学科由于各种原因暂不设题。

丛书设题以“问题”为主线，因而本世纪学术发展中确能构成“问题”的问题，将是本丛书首选书目。

丛书首辑已推出：

《20 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

《20 世纪中国伦理思潮问题》

《20 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

丛书第二辑将推出：

《20 世纪中国佛学问题》

《20 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

《20 世纪中国人文思潮问题》

丛书的出版不求形式的轰动，但求质量的扎实。丛书不希求一次性大规模推出而形成的所谓轰动性效应。因为这样做固然有很多好处，却极易形成追求数量规模而凑份之流弊。因此，我们将采取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的方式，慢慢出来。当然，我们也不会拖沓。如有可能，我们将尽力一次性多推出几本，以我们力之

所及最大可能地满足更多读者的要求。

这就要求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是作者朋友的支持。

丛书热情期待对本丛书所涉某一具体方面有深入研究且有成果问世，在学术界反响较佳的专家学者成为我们的作者。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从事本丛书所涉某一学科方面的研究人员、中青年教授、博士导师尤受欢迎。

丛书同时也热切期盼老一代专家学者赐稿与教正。

作者的支持，读者的厚爱，必将构成丛书赖以生存的坚实基础。编辑愿与各位朋友共同努力，尽力出好这套丛书，以便在 20 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最为壮观的世纪行将逝去之际，为她再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目 录

- 第一章 导论：出世？人世！……………（1）
- 一、晚清佛学伏流与 20 世纪佛学的二次革命 （2）
- 二、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向度 （12）
1. 宗教向度形成的心理素质及其与个人经历的关系 （13）
2. 人际关系方面的宗教向度 （17）
3. 社会关系方面的宗教向度 （22）
4. 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宗教向度 （24）
- 三、近代佛学复兴的原因 （26）
1. 佛学勃兴的内在契机 （27）
2. 佛教勃兴的文化背景 （35）
- 第二章 佛教的人世转向……………（38）
- 一、八指头陀的诗与思 （39）
1. 出世思想的形成和宗教向度的深化 （44）
2. 入世转向的蕴发和宗教观念的淡化 （51）
3. 禅诗中非理性的情绪体验 （58）
- 二、太虚与佛教三大革命 （63）
1. 佛教的三大革命 （67）
2. 佛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80）
- 三、弘一与导俗砭世的近代律学 （85）
1. 主要经历及思想发展的三个层次 （85）
2. 出家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 （93）
3. 佛学研究的特征 （99）
4. 通俗简易的布教方式 （106）

第三章	佛教哲学研究与思想体系的建立·····	(109)
一、	梁启超的佛教心理分析和佛教比较哲学研究	(111)
1.	佛教心理分析	(112)
2.	佛教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117)
二、	章太炎的法相唯识哲学	(123)
1.	真如本体论	(124)
2.	万法唯识论	(130)
3.	齐物观	(136)
4.	回真向俗的应用哲学	(141)
三、	熊十力本心本体的新唯识论	(146)
1.	对法相万法唯识思想的扬弃	(146)
2.	本心本体	(148)
3.	翕辟成变的体用不二说	(151)
四、	汤用彤的比较宗教学研究	(154)
1.	佛道思想比较看佛教的传入与佛道思想的调和	(155)
2.	佛玄思想比较看佛教发展及儒、道、释的互相趋附	(161)
3.	佛教各宗比较看佛法鼎盛与佛学中国化的内在契机	(180)
4.	佛教内外因素比较看佛法的渗透与其发展的休歇	(194)
第四章	唯识学研究·····	(202)
一、	空有二宗内在逻辑调适及法相宗之传衍	(202)
二、	竟无法相唯识学论	(206)
1.	法相唯识分宗说	(206)
2.	唯识抉择谈	(212)
3.	必要重复的简单结论	(223)
三、	太虚科学唯识宗说	(224)
1.	哲学非佛法，佛法包哲学	(226)
2.	唯识通科学，科学近唯识	(233)
3.	唯物唯识唯生论	(240)
第五章	佛学与儒学及科学·····	(244)
一、	佛学与儒学	(244)
1.	儒家对佛学的批判与改造	(246)

2. 佛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继承	(260)
3. 儒学与佛教的生活化	(271)
二、佛学与科学	(275)
1. 科学主义的昌盛	(276)
2. 佛学对科学主义的回应	(281)
3. 科学家对佛法的科学阐释	(296)
第六章 禅学与禅宗史研究	(301)
一、见仁见智的 20 世纪禅学研究	(302)
二、20 世纪禅宗研究之比较	(307)
1. 缘起之比较	(311)
2. 核心观念之比较	(319)
3. 方法之比较	(328)
4. 几个具体问题之比较	(343)
附录一：理念与探索——答赵汝明先生问	(357)
附录二：佛教与 21 世纪	(377)
后 记	(398)

第一章 导论：出世？人世！

两千年前，佛学自印度传入中国，自汉及今，先后经历了初传、兴起、鼎盛、渗透以及复兴五个阶段。初传期与黄老之学、黄老之术牵合附益，采补道家思维与民间方术，而成佛道式佛教和佛道式佛学。魏晋南北朝玄风飏起，名僧与名士相契合，佛玄式佛教既丰富了玄学之思辨，也推进了佛典的传译及佛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隋唐两代 400 余年，上承佛学数百年传译之英华，融中印文化于一体，光大其学，演为宗派，形成了纯粹的中国佛学而问鼎世界学术之林。原初对外在佛祖和十万诸佛的崇拜，进至为对心内佛的追求，外在的超越转向了内在的超越。这种由外向内超越的转换，实现了佛学在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学术思想向心性学说方面的发展。宋以下，禅风席卷天下，丛林制度之设虽致佛教残废而偏，佛学却向社会全面渗透，它重铸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陶冶了炎黄子孙的审美观念，佛学中心因此也就不在缙衣而流入居士长者之间。清之季世，内忧外患，千古未有之变局，公羊学家乃至乾嘉遗老，公然为佛弟子而兼治佛学，因而成晚清思想界的一股伏流。至 20 世纪，居士佛学以金陵刻经处为重镇，欲领袖群伦，佛门弟子亦步亦趋，以入世、救世相号召，高揭人生佛学之旗帜，力图重现六朝隋唐佛学之辉煌。这是由超越转向参与的第二次革命。

佛学在中国发展的五个阶段及其在发展中由外向内的超越，由超越向参与转化的两次革命，展现了中国佛学兼融中印文化的历史长卷。

晚清佛学伏流与 20 世纪以出世为人世的佛学入世转向的第二次革命，则是文化现代转型中，佛学问题的滥觞与核心。

一、晚清佛学伏流与 20 世纪 佛学的二次革命

两汉之交，佛教东传，在中国经历了初传、兴起，至隋唐便在空、有二宗分野、专注心性问题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派系和独具特色的中国佛学。其在思想理论上，集数百年之英华，援儒道入佛，重点阐述心性問題。特别是禅宗，把心外佛变为心内佛，由外在超越转向内在超越，实现了中国佛学的第一次革命。宋元以降，佛教在经历了鼎盛之后转入了全面渗透的阶段，特别是禅宗直觉体悟、凝思寂虑等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随缘任运的生活态度，恬澹幽隐、亦庄亦谐的审美情趣，直接影响了知识阶层，并渗透到整个社会心理，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这一时期，禅风虽然炽如烈火，禅家在理论上却无甚建树，“窄而深”的发展，反而把简易直捷的佛理推向神秘主义，机锋棒喝已遁入奇诡怪戾之途。尤其自百丈怀海创立禅院清规以来，尽洗僧人云游乞食，不事劳作之习，既强化了丛林组织形式，也以寺产奠定了佛门发展的经济基础。其“朝参暮请”之礼，“集众作务”的“普请”之法，“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律己精神和自食其力的住寺原则，虽然承继了佛门戒律的传统，力图保持和合、民主、平等乃至超越精神，但寺产与宗门成固定的所有关系，追求精神解脱的佛家弟子难免为寺产所累，封建宗法关系也便乘虚而入。寺院因此而成生利之所，僧人也就开始处运筹之境，登利禄之场了。显然，人世的中國佛教，尽管肯定了世间活动的价值，却不能不削弱伽兰的超越和民主意识。于是，或超亡送死，与鬼为邻；或逃禅避祸，远离嚣尘。元明以下，寺僧多乏学力，佛教宗风衰颓，隋唐时代教理昌明之象已丧失殆尽，后世“破戒僧人”也就屡见不鲜了。但

佛法全面渗透的结果却蔚成士子学人研习佛典之风，佛儒汇通之势反而强化了佛学的入世转向和参与精神。

道咸以降，国势凌夷，知识阶层早已失去附庸风雅、浅斟低吟的宣政风流，更无威加海内，歌舞升平的康乾雄姿。年少气盛之士无不疾首扼腕，倡言变法。然而固有之旧思想，寻章摘句，为六经之奴婢；传入之新思潮，来源浅轂，与传统心理格格而不相入，均不足以承担救亡图存之重任。于此“学问饥荒”之时，所谓新学家者无不祈向佛学，欲冶中西、儒佛、新学旧学为一炉，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因此而把佛学变成与当时社会思潮谐振的愤世嫉俗的慷慨悲歌。原来追求内在超越的佛学一变而为关注国家兴亡、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经世之学，实现了佛学由出世转向入世的第二次革命。如果说晚清佛学是一支以经世为特征的通向未来的伏流，那么，它与近代社会思潮的结合，便是在现实社会中搅起滔天巨浪的理论源泉。

可以这样说，由超越变参与，由出世而入世的晚清佛学，是中国佛学在近代复兴的特殊形态，是继隋唐之后，佛学世俗化的主要阶段。佛学的双相二重否定，双向价值取向，^①为晚清和20世纪佛学的涉世精神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反对科学却包孕科学；崇尚信仰又长于思辨；追求出世而又呼唤入世；否定理性却又在构建自己的玄理。晚清和20世纪佛学正是在上述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思辨与直觉，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冲突中，实现其入世转向的。

梁启超有言曰：“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②这支伏流导源于乾隆年间的居士

^① 作者认为，佛教遁世思想是对社会人生的否定，同时又批判俗界而表现为入世精神是二重否定。它否定人性，追求佛性，再由佛性回归人性，它否定现世而趋于净土，再将净土置于现世，则为双相二重否定。它追求个人解脱、灰身灭志的绝世思想，又要点燃觉悟、普渡众生的入世激情，便是其双向价值取向。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彭绍升。龚自珍、魏源以思辨、经世倡之于前，石埭杨仁山推波于后，“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又会。”^①居士佛学的兴起推动了20世纪佛学的全面发展，杨仁山以下，不仅有以太虚为代表的“汉系”寺僧和以欧阳渐为首的“宁系”居士，而且诸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汤用彤等著名学者也都同金陵刻经处有关。

概而言之，近代社会思潮由学者、居士和寺僧佛学三个方面协力推波助浪、从经世致用和哲学思辨两条道路向前推进。寺僧重在卫教，居士意在弘法，思想学术界佛学的研究宗旨则在于利生。三者虽有不同，然而其参与精神不仅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而且也实现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并铺就了一条从本体高度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

清末民初，整个社会的剧烈变革动摇了前此以往的思想观念和共同奉守的伦理生活。“姬孔之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也不足以持世。”^②现实世界的没落为新思想清扫出一块诞生之地，社会革命也进一步要求哲学之革命。于是，学者们开始由皓首穷经，以经学形式论证王治问题，转向辩证思维，以哲学形式探讨心性问题和经世理论。具有严密逻辑思辨性的佛教哲学，便成了他们首先选择的对象。前起龚自珍，中经谭嗣同、梁启超，继以章太炎、熊十力等，无不从佛学中撷取真如、心识、缘起，三性、四谛、六尘、八识诸如此类的范畴，并借助其思辨的方式，探求人的本质，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位置，人的认识的来源和藉以实现认知过程的形式，由是建立起以人为本位，并从本体高度反观人生的哲学体系。

这条道路发源于龚自珍晚年对天台宗的研究，至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而形成了20世纪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基本上完成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章太炎《无我论》。

了近代哲学革命。可以说，谭嗣同心本体论的多环状经世佛学逻辑结构→章太炎可以认知的真如本体论及围绕“识”自体展开的多重关系，半开放式的认识圆圈→熊十力无形无象，体用不二的本心本体论，是这一思辨之路的主线。而梁启超的佛教哲学及比较哲学研究，在这条主线中，不仅对佛教哲学有新的创见，而且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谭嗣同与龚自珍具有类似的思想特征。龚氏口不择言，动触时忌，是放荡不羁的才子；谭氏则是对国势有切肤之痛，对时政刻骨铭心憎恶的桀骜不驯的斗士。龚氏醉心仕途却落拓江湖，谭氏积极的参政意识和献身精神，最终使他血染菜市口。他的诗“画里移舟，鸥边就梦；镜中人影，衣上添香”实得龚氏浪漫主义风采之三昧。他大声疾呼要效法陈涉、杨玄感揭竿而起，拚九死以求一生，足见其革命性远在龚自珍之上，也远在魏源、康、梁诸君之上。所以，他的佛教哲学研究也无处不表现“不可一世之概”。虽然它着重论述了心本体的态势，以及心、心力、仁、以太、体用、道器等各种范畴的相互关系，但它那以平等为内涵的政治理想，以日新为宗旨的社会变革方针，以救世为准则，以勇敢无畏为精魂的自我奉献精神，始终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政治要求。因此又与魏源所开创的以经术求治术，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故称其为“经世佛学”。这是近代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为之后的章太炎、熊十力开拓出一条纯哲学思辨的径路。

章太炎的佛教哲学研究尽管也表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强烈忧患意识，注意力同样集中在社会政治问题之上，但在他疾呼“种族革命”的同时，又唯恐哲理“将成广陵散耳”^①，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场哲学革命，以纯思辨的形式，构建起以人为本位，包括本体论的确立，方法论的探究，以及应用哲学在内，兼顾名理

^① 章太炎《致潘景郑书》。

和人事，既具有西方理性思辨内容，又具有东方哲学色彩的法相唯识哲学。他取佛家的真如（Tath atā 或 Bhutathata），与柏拉图的伊跌耶（idea）即理念，康德的“自在之物”相比较，首先建立起他思想上的终极依托形式，即可以认知的真如本体论。章氏通过对佛学“三性”的探究，强调“在遍计所执之名言中，即无自性，离遍计所执之名言外，实有自性。是为圆成实性。”这一真实永恒的圆成实性，即“唯识实性”或称真如。它是自然而生，又可直接证得，是“一切事端之起”^①，是不依任何事物，不受制于任何规律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所以是常，是实，是普遍和永恒，是大千世界万象万物的根本特性，因此被他奉作哲学上的本体。章太炎竭力把真如同康德的“自在之物”的不可知性区分开来，赋予真如本体更加具体的内容。阿赖耶识既有真如的本体功能，又有具体的内涵，所以，被作为真如的显现物，运用到其哲学体系中，建立起“以自识为宗”的“万法唯识论”。他通过对三性、四分、八识的繁琐论证，集中说明依他起性即依相应的识为条件而派生现象界；遍计所执性对此现象界进行分别，以是为客观实有而生妄见；圆成实性离名言所执，排除客观实有的妄见，体认一切唯有识性而得契合真如，才是对世界的正确认识。这一认识的起点是自身的“识”，它的归宿，即认识对象也不过是“自识”所表现的色心诸法。它围绕自体形成了一个多重关系的圆。如果说，“真如本体论”是对佛学的改造和重建，“万法唯识论”是法相宗“唯识无境”说的直接演绎，那末，“齐物观”则是他以佛解庄的理论结晶。《齐物论释》便是这一结晶的拔萃之作。他对“齐物”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和统一即齐物的普遍性这两条规律。“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便是对上述规律的纲领性解释。必须承认，章氏所持“唯识无境”和对立统一的认识方法，把一切差别混绝在心识之中，固

^① 章太炎《建立宗教论》。

然表现了丰富的辩证思想，但这种病态的我向思维的最显著特征在于主观吞没客观，因此他最终虽然摆脱了他力图摆脱的虚无主义倾向，却陷入了相对主义的巢臼。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初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又表现出“求是”和“致用”的趋合心理，以补其哲学之不足。所谓“上契无生，下教十善”^①，正是这种趋合心理的产物，也是其应用哲学的参与形式，同样表现出佛学的涉世精神。

梁启超对佛学研究涉足甚广，但作为纯粹意义上的佛教哲学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不及其在佛教史、佛教典籍研究方面的贡献。然而他毕竟还不同于康有为、蔡元培等，纯以佛学为经世的借用工具，而是把佛学作为他认识社会、认知人生的部分根据。佛教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渗透在他的政治思想、社会观念、学术思想，乃至整个文化观念之中。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条思辨之路。梁氏的佛学研究之一是心理分析。他认为佛法就是心理学。从心理学角度，对佛法进行专门剖析，是梁氏的一大创造。然而他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尤为突出的是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他用斯宾塞的实体不可知论比附佛学；用佛教的“无我”肯定笛卡尔的“我思”，否定“我在”；他吸取马赫关于一切客观存在都是心理产物的精神一元论，丰富其唯心主义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又以佛教的慧观思想否认马赫的感觉经验……总之，唯心主义愈彻底，在其思想上的顺化愈迅速。他特别欣赏康德的“先验知性论”，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信仰主义，并在信仰主义驱动下表现了积极的参与精神。

时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熊十力“评判佛家空有二宗大义，而折衷于《易》”^②，旁参西方哲学，以“反本为学”，强调“反求

^① 章太炎《菴汉微言》。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序》。

实证”的创造性思维。他用主体构建客体，在对法相宗万法唯识观念扬弃的基础上，构建了他那翕闳成变，体用不二的本心本体论。他强调本心本体，无形、无相、非空，唯有“反求实证”，才能深切体认，才能自识本心，返本体仁，力图以此重塑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应该指出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熊十力的佛教哲学研究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们的性质很不相同。谭氏佛学重在经世，带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色彩；梁氏则多以佛法为研究对象，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继承和转化的历史责任。章氏的研究志在进行而且实现了传统哲学的革命，成就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熊氏则充分运用佛学的辩证思维，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理性思维的整体。可以这样说，20 世纪堪称哲学家的只有章、熊二人。

如果说佛学的思辨之路是在理性思维的层面，从本体高度观览现实社会和人生的话，它的救世主义则是其经世之路的核心内容，是 20 世纪佛学二次革命的起点和归宿。虽然佛家因慨叹人生之苦而悟万物皆空，处处表现其不甘沦溺俗界生死海的精神，其后发展而为追求一种无生、无死，也可以说是超越一切的永生境界。这种玄渺的终极追求，虽然是出世的，但是大乘不舍世间、自利利他；小乘虽然追求个人解脱，自证生死，但根本目的也在于救人脱离生死之海，所以又都具有积极入世的一面。因此，自魏源以下，思想家无不袭取佛法中的人世精神，逐渐形成一条以经术求治术，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治世兼而治心，便是其经世的具体实施。

魏源率先以佛经入世。他认为治世必本于心存泽物，致用首当人尽其才，人才尤须归本于人心的净化，把价值根源的人心为其经世之本。致用——人才——人心三者的逻辑推衍，使佛法和世法，治心和治世，从体用关系、社会实践的关系上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治心为本、治世为用的净土思想。

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把着眼点放在传统道德危机上。面对破碎